

## 再论《惜往日》《悲回风》的作者问题

赵 遂 夫

—

《惜往日》、《悲回风》两篇中所咏叹的伍子胥、介之推，其思想与屈原大相径庭。在可以确定为屈原的作品中没有写到这两个人物，更没有称赞他们的地方。《离骚》和《惜往日》中都提到伊尹、吕望、宁戚，但《离骚》中是借以说明只要“中情好修”，就会被明君所重用（“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惜往日》中却用以表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思想（“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也明显地表现出思想上的差异。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数责怀王”，刘勰批评屈原“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正是基于《惜往日》中说“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以伍子胥为“忠信死节”之臣；说吴王“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形成伍子胥的悲剧，自称为“贞臣”，而称楚王为“壅君”；基于《悲回风》中说要“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因为屈原是不可能赞扬为报父兄之仇而协助敌国攻克楚都，造成楚国宗庙圯毁、君臣离散之灾，又掘楚王之墓而鞭尸的伍子胥的<sup>①</sup>。《离骚》中虽对怀王的昏聩不明十分气愤，但形诸文字仍然说“哲王又不悟”，没有不顾礼数、完全打破君臣关系的情况。

事实上，只从《惜往日》、《悲回风》两篇中的措词上已可以断定非屈原所作。今举出五例：

1.《惜往日》：“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悲回风》云：“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这显然是旁人、后人所说的话，而非跳江者的夫子自道。《惜往日》的作者遗憾屈原结束了自己的写作，该说的话没有说完，便投江而死，然而他的死也并未唤醒糊涂的楚王醒悟；《悲回风》的作者说屈原屡次谏君，君王不听，自己背负着石头投江而死，但并无益于情形的转变。这难道是屈原自己说的吗？

<sup>①</sup>参拙文《〈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收入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2.《惜往日》中说：“情冤见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错置。”这完全表现了楚国在屈原死后国势日衰，屈原的话被验证，屈原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越来越被人们认识的情况下一些人的看法。

3.《惜往日》云：“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塞君之不昭。”曹道衡先生《评〈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一文中说：“在这段文字中，屈原已经遂自沉而‘卒没身’，哪里还能赋诗？如非相信有鬼，恐怕没法子叫已死的屈原来写这篇《惜往日》了吧！‘遂’和‘卒’分明是已经完成了的话。……再说这里的‘贞臣’、‘塞君’等辞和文句本身，都显然是第三者追述之口气。”<sup>①</sup>

4.“芳与泽其杂糅兮”一句，《楚辞》中出现三次，在对“泽”字的理解使用上，《惜往日》同《离骚》、《思美人》完全不同。《离骚》中说：“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思美人》中说：“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从下句可以看出，这两处中的“泽”与“芳”都是指好的性质。王逸注：“芳，德之臭也。泽，质之润也。糅，杂也。”朱熹《集注》：“芳，谓以香物为衣裳。泽，谓玉佩有润泽也。”此后各家大体依违于以上二说之间。闻一多《离骚解诂》云：“泽所以沐发者也。”“草取其芬芳，膏取其光泽，即此所谓芳与泽也。……馨香为草之质，光耀为泽之质。纳芳草于膏泽中糅而合之，膏之光泽与草之芬芳，俱无亏损。《思美人》曰：‘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芳谓馨香，华谓光泽，二者俱能秀出，即此昭质未亏之义。”其说虽与王、朱二说不同，然而也以“泽”为美好之物。但《惜往日》中说：“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言无人对“芳”与“泽”加以明白分辨。显然这里“泽”是作为“芳”的对立面来说的。也正由于这一句对屈原这两个“泽”字理解上的偏差，王夫之以来，一些学者并上两例也从“芳”的反义方面去寻找答案，或解作“垢”（王夫之），或解作“垢泽，指小人污秽者”（鲁笔），或解作“汗气”（陈远新），或解作“殫”，或解作“亵衣”（郭沫若），不一而足。其实，只是《惜往日》的作者误解了《离骚》与《思美人》中有关句子而已，当分别诠释。

5.“申旦”一词，《惜往日》中的用法也同屈原作品用法不同。《思美人》云：“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王逸未注，则是视为常见义。“申”在《楚辞》中多用为“重”之义，“旦”在《楚辞》中多用为“晨旦”之义。朱熹注：“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复旦也。”汪瑗注：“旦，天将晓也。申旦，犹言累日也。”说并是。然而《惜往日》云：“孰申旦而别之。”是以“申旦”作“明白”、“明明白白”解，也显然是误解了屈原的文意，因而也用错了意思。

由以上五点来看，《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所作，可以肯定。一些学者陈陈相因，维护旧说，以此两篇为屈原所作，既对屈原生平有关问题与屈原思想的研究造成混乱与障碍，也对楚辞作家与作品其他问题的解决造成了障碍。

①《光明日报》1956年4月1日《文学遗产》专栏。

不能因为王逸以来都如此说，便一定要维护。为了楚辞学的发展，为了靠近真理，我们必须纠正这类误说。

南宋李壁（1159—1222）的《王荆公诗注》在《闻吕望之解舟》注附《诗后漫记》附诗云：

《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吊属后来，文类玉与差。

李壁推测这两篇是宋玉、景差（《史记》中作“景差”，“差”为“瑳”之借）所作，真是卓见！近代以来疑《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所作的学者更是不少，近人如曾国藩在戊午年（1858）日记中写道：“《九章·惜往日》似伪作，当著论辨之。”后在其《经史百家杂钞》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二句下云：“此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也从词气方面对《惜往日》、《悲回风》二篇提出疑问。此后陈钟凡《楚辞各篇作者考》，陆侃如《楚辞·引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刘永济《屈原通笺》及《笺屈余义·〈惜往日〉、〈悲回风〉非屈作之证》，闻一多《论九章》、林庚《说橘颂》附《说九章》，谭戒甫《屈赋新编》，胡念贻《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写作年代》等都对《惜往日》、《悲回风》的作者提出怀疑，理由也越来越充分。但一语破的，不仅疑其非屈原所作，而且准确地指出作者的，是李壁。李壁的可贵处在于，他不像有的学者把它们看作“作伪”、“拟托”的结果，而只是指出从文字本身看，与宋玉、景差相近，疑为宋玉、景差所作。又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二云：

《惜往日》“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悲回风》云：“驟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是岂屈子口语耶？盖必唐勒、景差之徒为原而作，一时失其名，遂附入屈原耳。

说这两篇非屈原作品，但并非后人有意作伪，必为“唐勒、景差之徒”所作，混入屈原作品中，因而与李壁之说相近。

这里必须谈一谈的是，有个别主张《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作的学者认为这两篇是汉代人所作。对此，我们先引闻一多先生《论九章》中的一段话：

对于先秦文籍之可疑者，世人动辄斥为汉人赝作。一部分或许真是如此。但大部分恐怕是经过汉人窜乱而已。至于今本《九章》中《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三篇，我们认为时代较晚于前五篇，但恐怕晚也晚不到汉朝。最具体的证据是在属意和造句上，《九叹》剽袭《思美人》者两处，《七谏》剽袭《惜往日》者四处，剽袭《悲回风》者六处，可见《思美人》至迟在刘向时，《惜往日》、《悲回风》至迟在东方朔时，已经是脍炙人口的古代名著了。贾谊《吊屈原赋》云：“袅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偭）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螾与蛭螻。”这与《惜往日》中“慙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避（原误备）之，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四句语言相似。贾谊（前一六九年卒）去东方朔（前一三八为大中大夫给事中）不远。这里与其说被东方朔所剽袭的《惜往日》，在前一二十年也被贾

谊剽袭过。总之，《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三篇，虽非屈原所作，却也离屈原的时代不远。《惜往日》性质与贾谊《吊屈原赋》相近，大概是屈原死后，一位好抱打不平的无名作家作来凭吊他的文字。

论述十分精到。唯其中提到《思美人》，不过只是同《惜往日》、《悲回风》一样都以篇首三字为题，因而也置于被怀疑的范围之中。但取篇名的情形比较复杂，原有题已失去，后人以首三字为题的可能性有；屈原以为“思美人”三字正好可以概括本篇之意因而作为篇名，后来之作《惜往日》、《悲回风》者加以效法的可能性也有。因之，这不能作为《思美人》非屈作之理由。抛开这一点不说，以闻一多的精辟论述同李壁的卓见结合起来，《惜往日》、《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也便可以解决。

我以为《惜往日》为景瑳的作品，《悲回风》为宋玉的作品。下面在李壁、闻一多的基础上再加以论证。

## 二

先说《悲回风》。

首先，《悲回风》不是楚怀王和顷襄王前期的作品，而是楚都迁陈之后的作品。诗中说：“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前一句显然是楚都迁于淮河流域以后人的口吻。伍子胥投江而死，尸入于海，但只有淮河流域才言由淮入海。楚都迁陈（今淮阳）以前作家的作品多言“江汉”、“江夏”，而没有以淮河为喻的。所以，是宋玉、唐勒、景瑳之徒所作没有疑问。

其次，所反映思想不像《远游》、《惜誓》那样具有明显的道家思想，而在很多方面同宋玉的《九辩》相同或相近。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说：“篇中‘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雾雾’一段，全为方士口吻，与《远游》‘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一段相近，所以是同样的不可靠。”陆、冯二氏认为《悲回风》非屈原作是对的，但认为这一段文字全为方士口吻则欠妥。因为“吸湛露”、“漱凝霜”同《离骚》的“朝饮木兰之坠露”之类，并无大的不同。受《中国诗史》影响以为《悲回风》表现了道家思想的还有胡念贻。他说：

《悲回风》“上高岩之峭岸兮”以下就是写的凌空飞渡的事，所以东方朔《七谏·自悲》有“乘回风而远游”一句。东方朔可能是因为见到《悲回风》与《远游》题意相近，因而把“回风”与“远游”两个词儿连在一起的。《悲回风》的意境大部分是萧索、寂寞、枯槁，和《远游》的意境很相像，虽然它的道家方士化的思想和《远游》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别。这种意境和屈原作品所反映的完全不同。屈原的作品都是表现他是热爱生活的，他写得有生趣，有情感，那怕是写鬼神如《九歌》，绝笔如《怀沙》，都

是如此。<sup>①</sup>

《悲回风》同《远游》在意境上相像，乃是因为作者处于同一时代，反映了同样的社会气息，尚不能说明就是同一作者的作品。胡氏所说“这种意境和屈原作品所反映的完全不同”，是正确的。其所指出的东方朔《七谏》有取于《悲回风》，指出《悲回风》同《远游》在思想上有差别，也是真知灼见。唯胡念贻受陆、冯《中国诗史》的影响，仍认为《悲回风》有一点道家思想，是其小眚。

《悲回风》同《远游》反映的思想，完全不同，其中并不存在道家、神仙家思想。这只要作具体、深入、细致的分析，而不是人云亦云地承袭前人之说，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请看：

(一)从两篇中提到的人物进行比较，《远游》中提到赤松子、韩众、王乔、王子（王子晋），全是传说中的仙人；也提到傅说，却是从其“托星辰”言之。《悲回风》中则只提到彭咸、申徒狄和介子（介之推）、伯夷，全是楚先贤或古代贤人<sup>②</sup>。

(二)从提到的类型人物而言，《远游》中提到“真人”、“羽人”是庄周、杨朱以来道家向宗教转变过程中产生的理想人物，而《悲回风》中只说到“佳人”、“孤子”、“放子”，全为现实社会所有。

(三)从人生理想言，《远游》中提到“登仙”、“得一”、“化去”、“气变”、“绝氛埃”、“餐六气”、“漱正阳”、“含朝霞”、“丹丘”、“不死之旧乡”、“遐举”，全是神仙和方仙道的一套。《悲回风》中则只有“远志”、“抗迹”、“赋诗”、“諫君”之类，上面那些道家和原始道教的东西全然不见。

(四)从思想范畴言，《远游》中提到“神倏忽而不反，形容枯槁而独留”，已为后来道教尸解说之滥觞；提到“虚静”、“澹无为”、“精”、“壹息”、“审壹气”、“道”、“太仪”、“玄武”，也全是道家和早期道教理论的产物。而《悲回风》中则只有“情”、“志”、“远志”、“眇志”、“性”、“愁”、“文章”、“统世”、“从容”、“老”、“思心”、“省想”、“想感”等，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类型。

由以上四点看《悲回风》中毫无道家因素，思想上与《远游》泾渭分明，相去悬绝。陆侃如以来皆曰“有道家思想”，实皮相之论，殊不足取。

我已有文考证《远游》、《惜誓》同山东银雀山出土《论义御》皆为唐勒所

①胡念贻：《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见其《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②彭咸为楚远祖陆终之后。春秋时楚有名臣彭仲爽（《左传·襄公七年》）。《离骚》中说：“愿依彭咸之遗则”，即“法夫前修”之意。前人言彭咸为投水而死者，乃是臆说。申徒狄“申徒”为楚官名，即见于《随县曾侯乙墓楚简》中的“陞徒”。《史记·留侯世家》言“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韩国以前无申徒之官，此楚项梁以楚官制所立。又申徒狄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与《盗跖》，“申徒狄諫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亦南方楚地习水者自杀方式。联系各方面记述看，申徒狄为战国初年楚人。

作，并钩稽有关唐勒的史料，证明其任太史之官，主天官，掌星占，则其有道家、神仙家思想，也是自然的（至西汉时掌天官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尚重道家，其道理相同）。先秦至汉天官为世职，则唐勒应为唐昧之后。计其年，应为唐昧之孙<sup>①</sup>。《悲回风》非唐勒所作，可以肯定。

从各方面看《悲回风》实与宋玉的《九辩》相近，应为宋玉之作。理由有九：

（一）《悲回风》同《九辩》一样都表现出一个受打击、排挤而离开朝廷的文人或曰下级官吏的经历与思想。《九辩》云：“去故而就新”，“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羁旅而无友生”，“去乡离家兮徕远客”。《悲回风》云：“超悄悄而遂行”，“孤子吟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等，所反映的作者经历与思想情绪完全一样。

（二）《悲回风》同《九辩》反映了同样的政治环境。《九辩》云：“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纷忳忳之愿忠兮，妒被离而鄣之。”《悲回风》云：“万变其情岂可盖兮，孰虚伪之可长。”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朝廷中结党营私、颠倒黑白、虚伪欺诈的状况与作者对此的看法。

（三）都表现了极大的个人哀愁。《九辩》云：“中惛惛之淒怆兮，长大息而增歔。”“心怵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独悲愁之伤人兮，冯郁郁其何极。”《悲回风》云：“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娱。”情绪、心情，毫无差别。

（四）都表现出仕途无望隐居自保的思想。《九辩》云：“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按“云”为地名，亦作“郢”）。“《悲回风》云：“蛟龙隐其文章”，“独隐伏而思虑”。

（五）都表现出对个人品质、情怀的自重自赏。《九辩》云：“有美一人兮心不怿。”“私自怜兮何及，心怦怦兮谅直。”《悲回风》云：“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以自覩。”“照彭咸之所闻”。

（六）表现了同世俗决绝而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态度。《九辩》云：“骥不驥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馁而妄食。”“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悲回风》云：“故荼莽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正是出于一人之口。

（七）都表现出惜时叹老的情绪。《九辩》云：“时亹亹而过中兮，”“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悲回风》云：“岁惄惄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

<sup>①</sup>参拙文《唐勒〈论义御〉与楚辞向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收入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第528—542页。

(八)《九辩》中提到的人物如尧、舜、宁戚、申包胥、齐桓公、伯乐等历史人物，类型化人物如贫士、美人、诗人，思想范畴如“思”、“谅直”、“德”、“耿介”、“志”、“忠”、“美”、“武”、“性”、“诵”等，也同《悲回风》大体属于同一思想体系（见上部分《悲回风》同《远游》比较所列举四点）。

从以上八点即可以肯定《悲回风》从思想各个方面说与《九辩》一致，为宋玉之作，可以肯定。另外补充一条：

(九)《悲回风》所表现思想确实与宋玉思想性格一致。“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二句，旧说皆以为是说屈原，误。这是承接着上文“悲申徒之抗迹”一句言之。原文云：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  
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

是作者见到申徒狄投水之处，因生此感慨。学者们解释为是说屈原，实属牵强附会。然而近两千年来几至众口一词，也可见学术研究中因循习惯之严重。我们从这两句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同屈原是有些差别的。郭沫若在《屈原》一剧中把宋玉“写成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今昔蒲剑·写完五幕剧〈屈原〉之后》），自然是小说家言，可以不论，然而他确实也认为宋玉“实在是没有骨气”（给丁力的信，《文艺报》1979年第5期），责之过严，有失分寸。但是从《九辩》中一味诉说哀愁而缺乏刚强之性的情调来看，郭沫若产生这种看法也不能说毫无依据。

下面再从艺术方面看看《悲回风》同《九辩》的相近之处：

(一)都表现出对自然现象变化的敏感与观察的细致。可以说，都完全表现了一个很注重自然变化的诗人的眼光、感受和情怀。这一点随处可见，不详论，今只举两诗的开头：《九辩》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悲回风》是：“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不仅都以“悲”字起句，所表现情绪、心境也是相同的。

(二)两篇都写到漫漫长夜，不能入眠。《九辩》云：“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之极明。”《悲回风》云：“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看来作者有失眠症，极度的神经衰弱。这自然不仅同创作环境、诗人遭遇有关，也同作者的心理素质有关。

(三)都反映出对辞赋创作的痴心。《九辩》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自压桉而学诵。”《悲回风》云：“窃赋诗之所明。”

(四)两篇有些句子很相近，反映了同一作者铸词造句的习惯，应是其知识与行文习惯的潜意识反映。如《九辩》“虽重介之何益。”《悲回风》：“任重石之何益。”两句的意思和语言环境不同，不属于模仿的范围，显然是同一作者语言特征的反映。

(五)《九辩》中“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颺”。这也正是《悲回风》全篇意象的概括表现。

从以上创作背景和思想内容各方面（与《远游》不同者四点，与宋玉《九辩》相同相近者九点）及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悲回风》与《九辩》是同一位作者所作，它们的作者便是宋玉。

### 三

下面谈《惜往日》。

首先，《惜往日》中没有道家、神仙家思想，非唐勒所作，可以肯定。

其次，本篇在有些词语的运用上，其理解同宋玉不同。如《九辩》中“独申旦而不寤兮”，这同屈原《思美人》中“申旦以舒中情兮”一句的用法是相同的。但《惜往日》中“孰申旦而别之”以“申旦”作“明白”解，则完全不一样。所以，《惜往日》也可以肯定不是宋玉所作。

《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索隐》：《扬子法言》及《汉书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可见，屈原之后出名的“好辞而以赋见称”者，宋玉，唐勒之外，只有景瑳，而且景瑳也是尊爱屈原，在思想与屈原有相近的地方。《惜往日》既不是屈原作，也不是唐勒、宋玉作，则已知的楚辞作家，只有景瑳。因之，可以初步确定为景瑳所作。

再次，《惜往日》在内容上有两点十分突出。

（一）它完全是为悼念屈原而作。以往被认为也是悼屈之作的《悲回风》及写屈原的《九辩》，其实都是夫子自道，不关他人，把它们看作写屈原或悼屈之作是以往的《楚辞》学者将《离骚》看作“经”，而将《楚辞》中其他各篇都看作“传”，而形成的误解（传统的“传”都是解经的）。一经点破，人们会觉得过去这种推断十分可笑，但其说行之既久，学者便不以为非。《楚辞》中真正的悼屈之作，实只有这一篇。

（二）全篇表现出突出的法家思想，对屈原的称赞，也多着眼于这一点。如开头六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埃。

明确提出“明法度之嫌疑”，主张“国富强而法立”。再如其中责备奸佞之臣说：“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这里既在总结楚国走向衰亡的教训，同时也是对屈原遭遇佞臣壅君的惋惜与同情，也表现出作者强烈的反蔽壅的思想。诗中两处称楚王为“壅君”，实际是将造成亡国局面的责任追到了楚王身上。反对蔽壅，这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管子·明法》云：

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壅），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同书《明法解》中说：

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隔）闭而不得闻。如此者，壅遏之道也。

《韩非子·主道》云：

是故人主有五壅：臣蔽其主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

《申子》云：

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群书治要》卷一引）

这些法家著作都指出蔽塞的危害。又《荀子·成相》云：

上壅蔽，失辅势，任用谗夫不能制。

这正是说的六国末年楚国的状况。从这些法家人物和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物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惜往日》的作者看问题的角度，可以看出他对社会矛盾、政治病根的观察。

（三）明确表示反对“心治”。《惜往日》云：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衡而自载。乘泛汎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作者反对“背法度而心治”，认为这同乘骏马而不用辔衡，乘木筏而不用舟楫，都是自取灭亡之道。

（四）对屈原的悲剧也多从法治的眼光分析之，而不是像《悲回风》、《九辩》和《惜誓》等宋玉、唐勒之作的只是一般地感叹生不逢时和对小人得志的怨愤<sup>①</sup>。如：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

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

作者认为即使国君，也不能因一时喜怒而随意奖赏或处罚官员、百姓，应依法定罪，依法衡量对错。他认为造成屈原悲剧的关键是国君的“无度（准则）而弗察”（察，细致地看）。作者认为，在确定是非中应“参验”（据事实比较、验证），“省察”（细心考察）。

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法治观念极强的人。

在这里，有一点线索，可以大体确定景差是屈原之后同屈原的政治主张比较一致的人。

<sup>①</sup>《悲回风》中如“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是怨以往所希望实现之事均未能如愿，而将来的希望也十分遥远，令人悲伤。《九辩》中说：“恨其失时而无当”，“悼余生不时兮，逢此世之微攘”，《惜誓》云：“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都明显表现出生不逢时的意思。至于写小人得志之文字以上各篇中至为突出，不具引。

怀王之时，楚上柱国景翠同昭阳一样是主张联齐抗秦的，是屈原的支持者。楚怀王十五年楚国和中原各国都因齐国破燕而打破了山东六国的平衡，因而皆采取救燕攻齐之策。秦国则趁机攻克魏国的焦、曲沃，败韩于岸门。于是韩、魏投靠于秦，助秦以自保。楚怀王十七年（前312）楚上柱国景翠领兵围韩之壅氏，以遏制秦东进中所向披靡之势。《史记》载：“我助秦攻楚，围景翠。”<sup>①</sup>

又楚怀王二十一年（前308）秦攻韩之宜阳，“景翠以楚之众，临山而救之”<sup>②</sup>。

怀王二十八年，因楚太子质于秦时参与私斗而杀秦大夫，秦与齐、韩、魏共攻楚。次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楚将军景缺（《史记·楚世家》）。“楚令景翠以六臣赂齐，太子为质。”<sup>③</sup>

由以上几事可以看出景翠在当时的对外策略上主张联齐抗秦，同屈原是一致的。景翠于怀王二十一年已为上柱国，有执法之爵，故得以在怀王二十九年接景鲤任令尹之职。他的掌权与否同屈原在政治上之浮沉也大体相合。看来他同昭阳一样是屈原的支持者之一。因为先秦时楚国卿大夫仍基本保持世袭的方式（有一部分客卿，仍是外姓），景瑳对怀王以来朝廷之事甚熟，有透彻的认识，所以我以为他可能是景翠之子孙，就其生活年代言之，似为其孙。从这一点说，景瑳对屈原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具有鲜明的法家思想，就可以理解了。

综上所述，我以为《惜往日》为景瑳所作，《悲回风》为宋玉所作。这无论从作品的内容，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创作风格、语言特征，及楚国历史有关问题的哪一个方面来说，都可以肯定。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史记·六国年表》韩国一栏，韩宣惠王十一年。

②《战国策·东周·秦攻宜阳》。

③《战国策·楚策二·齐秦约攻楚》。